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0)02-0187-08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肖 晞 牛 勇

[摘 要] 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是其深刻内涵的三个重要层面。“和”作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及价值理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文化;“和”;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国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受其植根的传统的影响。目前,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还带有鲜明的现实性,从最深处影响着包括当代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仍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专门的研究。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

一、文化与外交

由于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致使对文化的界定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一个能被所有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概念,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们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871)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第 1 页)。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通过追溯“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对文化的现代用法有深远影响的梳理,他提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个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文化意义之一);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文化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文化意义之三)^[2](第 4 页)。美国人类文化学家 A. L. 克罗伯(A. L. Kroeber)和 C. 克拉克科(Clyde Kluckhohn)列举了 164 种文化定义之后,勉强地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源自行为的抽象概念”^[3](第 16-17 页)。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文化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同样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共有现象。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4](第 202-206 页)中国的学者们也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梁漱溟认为,“我今说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的东西。文化之本,应在经

作者简介:肖 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12。
牛 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09YJC81001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37)

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5] (第 6 页)陈序经将文化界定为“文化即是人们生活的总和”^[6] (第 251 页)。他通过对不同文化成分分类比较研究,进一步指出,宗教、经济、伦理和政治是文化特性的重心。国学大师钱穆同样因为文化内隐结构的极其宽泛与含糊,认为“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他认为,“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各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他进一步阐释道:“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并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7] (第 231 页)钱穆对文化的阐释中突出了文化精神层面,强调了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文化又贯穿于历史时空。其核心内涵和价值观念是数千年积淀的结果,并且这种核心内涵和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其存在与影响非一朝一夕的,而是具有跨时代的稳定性,能够代表民族的整个生命。在各种对文化含义的研究中,本文选取了钱穆关于文化含义的相关阐释。

冷战结束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也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国际关系宏观大理论的论争,如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起,到不同中观层次的理论或学说的出台,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等^[8] (第 41 页),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影响开始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领域^①。本文主要讨论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根据知名学者英国外交官欧内斯特·萨道义(Sir Ernest Satow)的定义,“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制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9] (第 3 页)在国际交往中,外交活动向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国的外交必然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影响。影响外交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国际法等方面的因素。例如,加拿大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谢弗(P. Schafer)曾指出,“文化在社区以及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10] (第 14 页)。国内学者王缉思指出,“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11] (第 130 页)。王晓德也明确指出,“文化不仅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一国对外政策的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着巨大影响”^[12] (第 2 页)。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借鉴诺斯(Douglass C. North)关于文化、认知与制度的理论,本文尝试从理论上更深入地分析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在 1994 年的论文中,丹佐(Arthur T. Denzau)和诺斯指出,制度和行为选择不仅取决于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而且取决于影响决策者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意识形态,而这是与决策者共同拥有的认知模型(mental model)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3] (第 3-31 页)。认知模型是决策者关于他们所处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包括什么样的关系和行为是最佳的认知。在 2005 年的专著中,诺斯借助认知科学探索了信仰、文化对行动和制度选择的影响。他指出,人类行为的一大特征是充满目的性,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和处理各种不确定性,尤其是人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决策者的抉择(choice)取决于他们对环境及其事件的感知(perception)。但是,归根结底,决策者建立起来帮助自己理解和解释周围世界的认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文化遗产影响的,是这个文化遗产的一部分^[14] (第 59-61 页)。总之,在这个目的性很强的行为过程中,文化将发挥非常大的影响。他指出,“共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途径来减化多样化的认知模型,这些模型是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拥有的并用来建构关于在代际间转移统一的感知之意义的”^[14] (第 27 页)。诺斯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各国文化如何影响其外交行为以及国际关系非常有启发性。

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充满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实现本国的利益,是各国的外交决策者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各国的外交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理想的国际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本国的外交战略应如何定位?本国在外交中应该如何对待其他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持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等等。毫无疑问,国际

形势及其变化趋势、地缘政治的特征以及本国的国力等都会影响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不同的决策者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不同的感知和理解,这些感知将会影响他们在外交领域的抉择。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决策者之间如何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共识呢?此时,一个基于共同的文化而形成的决策者“共同拥有”的认知模型就会发挥作用。这个文化中绵延传承下来的核心价值和信仰将会影响决策者在外交领域的认知模型,共同的文化背景将使得他们形成大致相同的认知模型,进而影响他们对外交问题的感知,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一个共同拥有的认知模型将使得这个国家外交领域的决策者不会认同、甚至不会形成那些与本国的文化传统不相符合的外交政策。而且,一个国家的文化越是历史深厚而且仍然影响深远,那么,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越强烈。当然,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种文化体系时,就会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冲突的认知模型,进而导致外交政策领域的冲突。同样地,这可能也是国家间外交政策及其理念常常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文化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的认知模型,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正如诺威尔(John P. Lovell)指出的,“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12](第3页)。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这些因素会在他们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王晓德也指出,“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与影响。这些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或行为符合了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了反映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这样,他们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的烙印。”^[12](第3页)因此,不同的国家、国民及其领导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种差异反映到外交上就是各国外交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例如,美国著名史学家哈里·沃德(Harry M. Ward)曾这样形容乘坐“五月花”号前往新大陆的清教徒的使命:“我们将建成山巅之城,世界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瞧着我们。”^[15](第37页)可见,美国文化传统中有根深蒂固的“天赋使命”的思想观念,使美国领导者在长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中带有强烈的干涉主义色彩。

具体地,文化将在两方面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文化将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内容。国内学者邢悦利用文化学理论中关于文化功能的内容提出,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对外交政策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16](第79-85页)。如中国深受传统文化中的“贵和”、“亲仁善邻”的思想的影响,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人普遍认为自身是上帝的选民,对人类的命运承担着特殊使命,在此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积极地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极力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与秩序”。其次,文化将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战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外交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行为和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表现出其独有的历史、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它对其他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因此外交除了具有人们通常所熟知的国家或社会集团属性外,同时还具有人文属性。’外交是由代表国家的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社会现象,特定的文化中的规范、习惯,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影响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形式。”^[17](第34-39页)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中实力与暴力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大国奉行的依然是实力主义,其外交战略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将霸权建立在军备与建立军事联盟之上、将自己安全建立在别人的不安全之上的思维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也依然是西方大国的基本战略行为方式之一。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化中“贵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是一个真正普遍性的原则,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

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处理国家、民族间的关系时,中国外交战略的追求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国家间的团结合作。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8](第 14 页)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中国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和”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之道,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生命之道。“和”是被普遍认同的、一般的原理、法则,亦是思维自由创造的理想价值。无论是天地万物的新生,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还是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穿着“和”或“和合”精神^[19](第 276 页)。

“和”在甲骨文文中已经很常见^[19](第 375-376)。其义蕴含着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元素、要素要融合的意思。“和”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含义,先秦儒、道、墨、管、法各家都讲“和”。儒墨强调仁爱之和,道家强调同一之和,管子讲蓄养之和,法家讲主从之和^[19](第 276-280 页)。本文认为,在中国文化“和”的思想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是其深厚内涵的三个重要层面。

(一)“以和为贵”

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20](《学而》第 18 页),治理国家、礼仪制度及处理大小事,以“和”为价值标准。孔子主张为政应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21](《昭公二十年》第 1022 页)。孟子在对当时诸侯争霸连年战争思考时,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2](《公孙丑下》第 64 页)。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影响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中,将“人和”放在了首位。荀子弘扬和而生生的思想,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23](《天论》第 96 页),强调“和”是万物得以生生日新的根据。任何事物无“和”或非“和”,都不能产生新生命。汉代董仲舒指出,“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下之奉也”^[24](《循天之道》第 92 页),将“和”作为天地间最普遍的原则。中国的“以和为贵”的思想成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

(二)“和而不同”

“和”讲求和睦、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抹杀差异与冲突,相反是在承认差异与冲突的前提下,求合作、和平、和谐。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有名的“和同之辨”。《国语·郑语》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②。史伯认为把两种以上的不同事物调和统一起来叫做“和”,如果简单地把相同的事物和而为一,叫做“同”。只有不同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多样统一的状态,收到和谐的效果。如果只是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左传》也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这样一段对话^③。晏婴将“和”比作煮汤、奏乐,只有各种材料调配适当,才能做出美味的鲜汤,只有不同的音律配合得当,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并进一步推广到君臣关系上,从而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0](《子路》第 115 页)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源泉,具体表现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尊重别国利益,主张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要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及其规律,体现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谐精神,同时“天人合一”也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主张追求和谐的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远在先秦就已经产生,但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则是由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最先提出来的^[25](第 377-380 页)。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21](《昭公二十五年》第 1058 页)他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即自然界的必然

法则,人必须按“礼”行事,这是把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反应了天与人可以沟通、可以按统一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2]《《尽心上》第207页)孟子把人性与天道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相通。到汉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演变为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学说入儒,提出“人副天数”之说。他把人体与自然界的时令节后相比拟,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鼓吹“以类合之,天人一也”^[24]《《阴阳义》第71页)。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认为儒者“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张载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太虚之气,人与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张载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协调^[25](第379页)。“天人合一”体现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协调一致,发展到现代更加强调其所蕴含的和谐理念,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之间的统一和谐。中国在对外关系的理念中根植于对和谐的追求,不同于西方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影响下所奉行和推行的“征服、扩张”理念。

三、“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及战略目标。

(一)“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建国以来形成的指导中国外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其主张以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和目的,蕴含了“贵和”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这种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最终“共处、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个性,和平共处而非消灭异己。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履行者。周恩来总理最早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1953年12月31日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中印、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与亚洲和世界的关系。在联合声明中把“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在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又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方式便确定下来。

50多年来,中国在处理各种类型国家的对外关系中,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温家宝总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道:“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165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同绝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增进了同这些国家的友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程度的所有国家改善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国坚定地、真诚地、创造性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不开的。”^[26](第403页)

(二)“和”影响中国外交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以五千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扩式”的,即国家的发展崛起伴随着侵略战争、征服别国、并吞他国领土或建立殖民统治。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另一种方式是“内敛式”的,即发展崛起不向外扩张,不征服世界,不建立殖民地,而致力于本国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

路无疑属于后者。

和平发展最初是邓小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的中国政府对“时代主题”或“问题”的战略判断。1985 年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27](第 104 页)。在 2004 年春之后,即在 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政府逐渐把“和平发展”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判断转向本国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思维,规定为现在和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在 2005 年 3 月 5 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和平发展”作了具体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自身发展;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长期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就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28](第 3 版)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①

可以说,“和平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光大,是“和”文化沃土结出的硕果。儒家主张“以和为贵”,在处事方式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0](《颜渊》第 100 页)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0](《雍也》第 58 页)。即要求一个人立身处事要为别人着想,自己想要立身,也要别人立身;自己想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中国和平发展,不侵略别国,不征服世界,不谋求霸权,正是受到传统文化中“和”的影响,认为只有自己立国,也让他人立国,自己立国才能持久。

(三)“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和谐世界

“和”强调和平,和谐。在承认和尊重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还要追求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融合,达到和谐的状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在追求五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与家庭的和谐;四是人与人的和谐;五是国与国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追求“和”,或和谐的精神。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目的在于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2005 年 4 月 22 日,胡锦涛在雅加达亚洲峰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他说:“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⑤2005 年 9 月 15 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扼要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内涵^⑥。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思想,其含义是:以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以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尊重多样性、互相包容的新文化观,从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国家行为规范三个方面构建一个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2009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被认为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古代中国人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希望与自然和平共处。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到政治领域,是把人际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际和谐乃至构筑太平盛世、大同世界,作为治理国家的政治追求,而不把炫耀武力、对外扩张、建立霸权作为政治追求。

四、结 语

一国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深受其植根的传统的影响。正如诺斯所说的,“人们拥有的信仰决定着人们的选择”^[14](第 23 页)。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合作,以及积极追求世界和谐的诚意和举动,也逐渐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深受“和”影响的中国外交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与收获。当然,本文的探讨仍然是初步的。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深入地研究文化如何影响决策者在外交领域的认知过程,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进而影响决策者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以及最后的抉择。此外,需要引入认知科学和制度理论的相关成果,研究决策者在学习过程中何时、为什么会改变他们的信仰,进而改变他们的认知模型。

注 释:

-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还有Joyce, James Avery. 1978. *The New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London: Macmillan; Klotz, Audie. 1995.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lastair Iain & Robert S. Ros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3月16日,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的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从文化视角探讨中国外交的学术会议。
- ②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参见张立文:《和合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③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酉盗、酿、盐梅以烹鱼肉,焙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参见张立文:《和合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④ 参见胡锦涛:《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载 <http://news.sina.com.cn/c>, 2007-10-24。
- ⑤ 参见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载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343050.html>, 2005-04-22。
- ⑥ 参见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载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 2005-09-16。
- ⑦ 参见温家宝:《200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载 <http://cq.qq.com/a>, 2009-03-05。

[参 考 文 献]

- [1]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2]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3] 计秋枫、冯梁等:《英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 [4]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
-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 [6] 陈序经:《文化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7] 钱 穆:《中国文化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8] 肖 晞、于素秋:《论文化对国际制度创新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08 年第 5 期。
- [9] [英] 戈尔·布恩:《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 [10] [加] 谢弗:《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上,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 年第 12 期。
- [11] 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 [12]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 [13] Denzau, Arthur T. & Douglass C. North. 1994.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47(1).
- [14] North, Douglass C.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5] Ward, Harry M. 1991. *Colonial America 1607—1763*.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 [16] 邢 悦:《文化功能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载《太平洋学报》2002 年第 3 期。
- [17]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载《国际论坛》2003 年第 4 期。
- [18] 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19] 张立文:《和合学》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20] 《论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21] 陈戌国:《春秋左传校注》下册,长沙:岳麓书社 2006 年版。
- [22] 《孟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23] 《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24] 《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25]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中国外交》,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 [2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28]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5 年 3 月 5 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05 年 3 月 5 日。

(责任编辑 叶娟丽)

The Influence of the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Xiao Xi¹, Niu Yong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an important deciding variable that affects states' diplomacy.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ing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foreign relations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Chinese cultur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The ideology, criterion of conduct, value concepts it contains have great historical sense and bright realistic. "Harmony" embodies the essenc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 existed in the whol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culture.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senses in its deep connotation, "value harmony", "harmony but not conformity",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beings". In new era, China sets the objective to establish harmonious world. "Harmony" as the essences of Chinese culture has osmosis influence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development road and strategic objective of Chinese diplomacy.

Key words: culture; "harmony"; Chinese diplomacy